

东干拼音文字与汉字拉丁化的回顾与思考

常立霓

(上海政法学院新闻传播与中文系 上海 201701)

【内容摘要】东干人借助俄文字母成功地将晚清时期西北方言拼音化,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汉字拉丁化却终未普及。本文一方面分析东干拼音文字的经验对汉字拼音化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着重从拼音化的目的、影响汉字拉丁化的主客观原因等方面对二者进行比对研究,既揭示了东干文的某些局限性,同时又反观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汉字拉丁化运动的得与失。

【关键词】东干 拼音文字 汉字拉丁化

中图分类号 H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1)12-0095-04

“东干”是 130 多年前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迁居中亚的华人后裔,现已发展到 10 万余人。东干第一批移民几乎都是农民,汉字失传,只会讲西北方言,他们借助 33 个俄文字母,外加自造的 5 个新字母来拼写汉字,创制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汉语文字——东干文。20 世纪 30 年代东干书面文学随之诞生,产生了诗歌、小说、散文、口歌、口溜、古今儿等大量反映东干历史、文化与人民生活的文艺作品。

东干文学因其独特性与复杂性,对中国古典文学、海外华文文学、语言学、民俗学、回族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均有参照意义,尤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同样具有某些启示与比照作用。一是在时间段上东干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接近;二是东干文学、中国现代文学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二者采取的文化策略具有可比性;三是东干族集中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地区,东干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都受苏联文化影响。因此东干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在诸如“汉字拉丁化”、言文一致、文学民族化等一些具体问题上可互为参照,比对研究,具有启示与借鉴作用。限于篇幅,本文拟着重讨论东干拼音文字与汉字拉丁化问题。

“汉字拉丁化”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汉字拉丁化”是不是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文字改革策略,汉字拉丁化利与弊如何权衡,设若汉字拉丁化真正推广开了,而不是“几个读书人在书房里商量出来的方案”^[1](P100)],那么它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难道这些问题仅仅只是假设吗?东干文作为世界上唯一成功的汉字拼音化文字,从诸多方面为中国现代文学中这一争论不休的命题提供了一个实例,通过分析东干文在实际操作中的可能性与局限性,来反观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汉字拉丁化运动。

一、东干文与其它东亚汉字圈国家拼音化文字异同
“汉字拼音化”并非中国特有的问题,凡是东亚汉文化

圈的国家如越南、日本、朝鲜等都面临过这一问题。汉文化圈在很大程度上以是否使用汉文字而划分。“它不同于印度教、伊斯兰教各国,内聚力来自宗教的力量;它又不同于拉丁语系或盎格鲁—撒克逊语系各国,由共同的母语派生出各国的民族语言,这一区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自萌生于中国而通用于四邻的汉字。”^[2](P1)]

自东汉伊始,越南使用汉字约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从 16 世纪中叶开始,葡萄牙、法国等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越南,为了便于学习越语与传播天主教,他们通过拉丁字母记录越南语,渐渐地创造了越南的拼音文字,越南人称“国语字”。1878 年,法国殖民者正式推行国语字,与汉字同时使用。1945 年建国后,越南停止使用汉字,全面推行拼音文字,越南语的文字从意音文字成功过渡到拼音文字。

朝鲜在 1444 年以前一直使用汉字,之后朝鲜人创建了拼音文字。这是真正的在同一种语言文化基础上实现的文字改革,即在同一种语言文化基础上用拼音文字替换意音文字。

日语文字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公元前 4 至 5 世纪汉字由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后来日本人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了假名。假名分平假名和片假名,是一种音节文字。和朝鲜语拼音文字出现的方式略有不同,日本假名是在汉字的基础上产生的。日本现在基本上是假名和汉字混用,但完全用假名也可以。因此日语可以说也完成了由意音文字到拼音文字的过渡。

以上这些曾经大量使用过汉字的国家最终都由意音文字过渡到了拼音文字,东干文也是汉字拼音化成功的一例,那么东干文与之又有什么不同呢?

汉字传入之前,东亚汉文化圈的国家都属于仅有民族语言而无文字的“接收集团”,汉字的输入,使其书面语言成

* 本文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批准号 09YS495)。

* 作者简介:常立霓(1974—),女,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东干文学研究。

为可能,获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汉字与汉字东亚文化圈的民族语言之间缺乏直接的对应性,即“言”与“文”不一致,从语音上看,汉字基本上是一个字记录一个语素一个音节,而朝鲜语和日语都是粘着语,一个语素多个音节的情况很多,汉字并不完全适应这些国家的本土语言。所以虽然借用、仿造汉字帮助他们记录历史、识字读文,但文字与语言的错位一直困扰着这些国家,于是长时间以来引出以“言文一致”为目标的语文变革。而东干文产生的前提是汉字失传,但语言却是地地道道的汉语,所以一旦借用拼音文字流利地拼读汉语时,“言”与“文”可以毫无障碍地保持高度一致。当然在东干文的创制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有些读音无法用斯拉夫文字表示,于是自创了5个字母来代替。简言之,汉文化圈中的汉字拼音化问题的核心是汉字与拼音化的关系,而东干文的拼音化核心却是汉语与拼音化的关系。

二、为什么东干文的汉语拼音化能够成功而中国百年的汉字拼音化却难以修成正果?

中国的汉字拼音化运动与东干文的创制都是在十月革命后苏联开展扫盲运动中进行的。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文盲众多,大力开展扫盲运动,一方面苏联政府主张俄文拉丁化,另一方面苏联当时有115个民族和部族连文字也没有。苏联的拉丁化运动从1921年开始持续了15年,1937年结束。列宁赞誉这个运动是“东方伟大的革命”。

汉字拼音化的直接动因是当时苏联远东地区有十万中国侨工,工人大多都是文盲。1930年瞿秋白出版《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小册子后,苏联汉学家龙果夫、郭质生和中国的萧三等人都加入到方案的制订与讨论当中。1934年在大众化的讨论中苏联的拼音化成就被介绍进国内。拼音化运动成为文学大众化的重要尝试手段。中国汉字的拼音化运动从1934年开始至1955年进行了21年。其间一方面由于拉丁化自身的一些学理问题,另一方面拉丁化推行的社会环境恶劣,“汉字拉丁化”被国民党当作共产党宣传政治思想的工具而被查禁。另外民族救亡、抗战等都打破了拉丁化的进程,使得汉字拉丁化始终局限在一时、一地、某些群体中,并未在全国普遍推广开来。

东干文的创制也有赖于苏联这次大规模的为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创造文字的潮流。第一代迁居中亚的东干人基本上都是文盲,只会说汉语,却不认识汉字。随着20年代的拉丁化运动与文字改革,1932年苏联学者帮助东干族创造了拉丁化的东干字母,包括31个拉丁字母和自创的5个字母,一个字母表达一个音素,不标声调。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开办学校、成立研究中心、编订教科书、出版书籍、发行报纸(1932年创办《东火星》报)等方式展开,东干文普及率很高,截至1937年,在东干人集中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70%的东干人已脱盲^{[3](P135)}。

可以说,汉字拉丁化与东干文的发生时间、背景、创制目的甚至参与人都很相似。比如东干文的主要创制者、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人亚瑟尔·十娃子与中国作家萧三交情甚深,而萧三在苏联时期、解放区时期都是推动汉字拉丁化的主将。又如龙果夫等许多苏联语言学家,既积极地参与了东干文的创制,又投入了汉字拉丁化的方案制订。这些方面的

要素无疑使得东干语拼音化与汉字拉丁化有着相类似的思路与方法。

东干族作为中国华裔,母语就是汉语,似乎东干文的汉语拼音化实践对于中国汉语拉丁化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那么为什么东干的汉语拼音化只用很短的时间就能成功,而中国汉语拼音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历时弥久却步履维艰,难以推广?

1.二者拼音化的目的不同。中国的汉字拼音化前期在工具理性的笼罩下,拼音化文字与汉字分别代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推动汉字拼音化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向西方文明学习的心态;后期力推汉字拼音化,则立足于文学大众化、通俗化的目的,以最便利易学的文字进行大众扫盲,从而达到“五四”文学“启蒙”的初衷。

汉语拼音化提倡之初存在着两种意见:拼音文字与汉字并存,留拼音文字弃汉字。前者急于借用简单易学的拼音化汉字扫盲,但并不排斥汉字,二者可共同使用。而后者则认为汉字代表着文化霸权,必须以拉丁化文字代替汉字。瞿秋白是主张废除汉字、制定拉丁文字方案的重要奠基人。他发表过一系列抨击汉字的激烈言辞。瞿秋白曾经提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化必须罗马化。罗马化或者拉丁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的意思。这是要根本废除汉字。”^{[4](P690)}瞿秋白接受了文字具有阶级性的思想,认为“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4](P690)}。当时也有人不同意废除汉字,例如1936年吴俊升提议通过改革教学方法来提高学习汉字的效率。

汉字拉丁化之所以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在更大程度上因为它关涉到汉文化与民族命运。汉文化以汉语为交流语言、以汉字为书面沟通的载体,维系着中华民族。如若废除汉字,那将是中国民族的灾难。东干族与其他世界上的华侨群体相比,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其凝聚力一方面来自于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模式,另一方面作为回民,伊斯兰教在团结东干人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东干人能在俄罗斯文化、突厥文化的包围中坚持独立的民族性,也与其讲方言有着很大的关系。

东干文的拼音化,始自苏联20年代开始的扫盲运动。包括东干族在内的苏联许多民族没有文字,“十月革命后,苏联总人口的72%是文盲,特别在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和部族中,文盲的比例更高。其中有115个民族和部族根本没有文字,还有一些民族和部族虽然有文字,可是很不完善,极难学习。”^{[5](P3)}东干文是因无民族文字而在苏联二三十年代文字拉丁化运动过程中创制而成的。

2.影响汉语拉丁化的条件不同。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很多,各地群众甚至互不通音,这成为汉语拼音化过程中一大无法逾越的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汉字拉丁化之初就编制了方言版拉丁化新文字。1930年瞿秋白编制的《中国拉丁化的字母》方案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拟制的,1934年至1937年,上海话、苏州话、无锡话、宁波话、温州话、广州话、潮汕话、客家话、福州话、厦门话、湖北话、四川话、桂林话、梧州话等14种方言先后制订了各自方言版拉

丁化新文字方案或草案,但实际只有上海话、广州话、潮汕话和厦门话的拉丁化新文字推行过。各地方言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任何一种汉字拉丁化方案的推行。即便对于极力主张汉字拉丁化的瞿秋白而言,对于方言的问题,他在1931年《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中认为,“无产阶级在‘五方杂处’的大城市和工厂里,正在天天创造普通话,这必然是各地方土话的互相让步,所谓‘官话’的软化。统一言语的任务,也落到无产阶级身上。……无产阶级自己的话,将要领导和接受一般知识分子现在口头上的俗语——从最普通的日常谈话到政治演讲——使它形成现代的中国普通话。自然,照中国现状,还会很久的保存着小城市和农村的各地方的土话,这在特殊必要的时候,也要用它来写的。”^{[5](P78)}所以有学者说,当中国方言消失以前还必须得用汉字。

东干语具有内部统一性,均为陕、甘地区方言,标准的东干语或东干书面语言以甘肃话为主。陕、甘地域相邻,语言相近,不存在方言分歧造成的拼写上的不统一。“拼音文字必须建立在民族共同语的基础之上,必须按照共同的标准语来制订语音系统。东干人最初进入中亚,方言口语比较复杂,有陕西话、甘肃话、宁夏话、青海话等。但这些中国方言在中亚经过融合之后,最终以甘肃话为民族共同语,以甘肃陇中片语音为标准音,才产生了记录东干语的东干文。”^{[6](P220-221)}

也正因为东干语的这种特殊性,使得语言学界对于东干语到底是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分歧很大。持赞同观点的是前苏联语言学家A.A.龙果夫教授,他认为东干语来源于汉语,但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语言。德国学者吕恒力给予东干文相当的独立性,他认为“汉语语支包括好多方言,但只有两种书面语,一是以汉字为标准文字的汉语普通话,一是用斯拉夫文字书写的苏联(东干)回族民族语言”^[7]。而中国语言学学者海峰、林涛等认为东干语是汉语方言在境外的一种变体。他们从东干语的形态学类型未转化与改变,历史渊源上东干语与中国汉语西北方言中原话官话有着一脉相承的共源关系,东干语在语音、词汇和语法诸语言要素上只发生了局部的变异等几个方面来论证这一观点。

3.文本继承问题也是汉语拼音化遭来非议的原因之一。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卷帙浩繁的经典文本因汉字才得以保存,今人也因汉字得以与几千年前的古人进行沟通,如若汉字拼音化,汉字势必会逐渐废弃,那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量的传统文化会不会就此消失?而东干语拼音化却不存在这个棘手的问题。本来迁居中亚的多为目不识丁的农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文本知之甚少,东干人基本上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文本:一是通过俄文翻译来了解;二是创立东干文后对中国文化文本进行翻译,如老舍的《月牙儿》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为东干人民所熟悉;三是通过民间故事、传说等口头文学间接地了解。所以不存在必须保留汉字继承传统经典文本的问题。

东干人能够成功地实现汉语拼音化,主要由于它无须承担中国文学现代化这一历史使命,既无中西文化比较中的弱国心态,也无古今选择的困境。加之东干文的使用主体渴望有一种本民族的文字,东干本土知识分子一直力图创

造一种可以记录、整理、传承本民族文化的载体,前苏联也积极推行民族平等原则,为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文字,正是以上这些主客观原因,促成了东干文的诞生。文字创制成功后,还要成功地推广与普及,才能算真正成功。前苏联及东干学者通过积极开办学校、广播、编写教材、报纸、杂志等形式进行推广,其最有说服力的成果就是在短短几十年中仅有十万人的小群体中却出现了影响力较大的一批东干作家,创作了大量的东干文学作品。

三、东干语在汉语拼音化过程中的局限性

东干族汉语拼音化成功了,但在汉语拼音化过程中仍然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中国汉语拼音化过程中遭遇到的。

比如同音字的问题。汉语作为意音文字其特点是同音字多,要依靠不同字形来区分字义。这对于失去汉字以斯拉夫字母为载体的东干语来说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加之东干文不标声调,就更增加了同音文字辨识的难度。东干族只得借用一些辅助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给单音节词标上调号或者借助俄文来解释,但其作用还很有限。东干文学也随之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出它的局限性来。

1.东干文学作品译成中文的时候,一些不太熟悉西北方言的译者在翻译时容易出错。比如亚瑟尔·十娃子的诗《我爷的城》开头四行出现了三种误译文本:第一种译法:“雪花飘落在我头上/我也爱唱哩/虽然眼睫毛上已结下了一寸多的霜。”第二种译法:“雪也落到头上哩/我爷孽障。/眼睫毛上也落哩一层冻霜。”第三种译法:“雪也落到头上哩/我爷孽障。/眼睫毛上也落哩/一层冻霜。”而原文中眼睫毛应为“眼眨毛”。“一层冻霜”中的“冻”原文拼为“du”,从发音看,不是“多”也不是“冻”,而是“毒”,即下了一层毒霜,风霜雪剑,何其毒也之意。正因为东干文的特殊的标音法及同音词的存在导致了多种误译。

2.因为没有汉字的支撑,随着与母体文化的分离,许多字只留其音却不知其义。学者赵塔里木曾对东干民歌在口头传承的过程进行分析发现,个别唱词在失去原有的语音外壳的同时被赋予具有新词义的语音,从而出现了由语音转变引起的词义替换现象。他举例民歌“茉莉花”由江南传唱到西北地区,东干人再由西北地区把这首歌带至中亚时“茉莉花”本义已完全丢失,并按照东干语汇的习惯,在茉莉花一词后附加一“子”后缀,变成了“毛李子花”,意为“毛李子树上开的花”^[8]。在东干方言语音的干扰下,没有汉字对语音的固定,语音极易发生变异,进而影响到语义的变化。东干语不标声调,依靠语义环境来理解同音字。东干人长期使用东干语,在心理与语言等方面约定俗成,通过联系上下文可以顺利地读出语义来,但对于非东干族来说就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尤其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大量同音词的出现可能并非好事。基于诗歌的跳跃性、抽象性等特点,要在语义联系不甚紧密的诗歌语境中猜测字义,就显得相当困难。东干文学作品呈现出的一大特点,就是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品最多,而现代主义的作品寥寥,这固然与当时苏联的文学创作主流、作家注重表现东干人民现实生活有关,但不容忽视的是,语言的形式对文学作品内容的限定(下转第100页)

决方案”的险境,不惜昧着良心以牺牲杰克布来换取彼得的安全。虽然做法不地道,却能读出小女子爱的执著与痴情。

2004年严歌苓随派驻尼日利亚的丈夫来非洲定居,在那里写出了《一个女人的史诗》,小说以灵动的文字讲述了田苏菲在3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竭尽心智守护自己爱情与婚姻的动人故事。1947年,十六岁的中学生田苏菲为了浪漫激情的生活,离家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文工团员。她没有嫁给喜欢她的旅长都汉,却爱上了“集猖狂、柔弱、放荡不羁、细致入微于一身”的政治干事欧阳萸。虽然嫁给了他,但是小市民出身的田苏菲,却不是上海世家出身、心地清高的欧阳萸能倾心的。这样的婚姻,对田苏菲而言,极具压力和危机感,她只能用加倍的奉献去克服危机。为了走近欧阳萸,田苏菲从最灿烂的青春,到渐归平淡的中年,30多年来不管政治上的风云突变一意维护自己爱情。田苏菲的爱既不盲目也不功利,而是真情的选择,在她眼光所及的世界里,只有欧阳入了眼,吻合了她的审美标准,正因如此,她对欧阳萸的爱情就近似于一种宗教情感,一种高于自我存在的最神圣情感,其顶点就是牺牲精神。尽管这种沉实而具体的爱被只有12岁的女儿毫不留情地界定为“妈妈爱爸爸,爱的太笨!”。但最终她的爱赢得欧阳萸的死心塌地。这就是一个女人谱写出的一首伟大的爱情史诗。严歌苓认为,只要曾真心去爱过,没有任何一样痛苦是不值得的,所有的伤害都是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使得人的心灵愈加丰富。而

执着的追求过,痴迷过的人,更懂得爱情的美好,更懂得去爱,才没有枉费这一场繁华而盛大的生命。

严歌苓的写作被称为“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作品通过对现代社会人性的变迁及女性情感隐痛的细腻描写,体现了作家的价值取向和一定的叙事伦理。小说叙事意义在于,不仅仅讲述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故事,而是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进行富有寓意的升华,而这种升华的内在底蕴使我们看到了严歌苓超越世俗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 [1]饶芃子,陈瑞琳.“歌”者之歌之序横看成岭侧成峰——海外文坛随想录[J].2004(1).
- [2]桑塔格.同时,小说家与道德考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2009:218-219.
- [3]舒欣.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旅美作家[J].南方作家,2002(1):29.
- [4]严歌苓.寄居者[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109.
- [5]刘惠丽.女性与人性的对话——谈严歌苓小说的女性叙事[J].唐都学刊,2008(4):103.
- [6]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358.
- [7]王文璨.柔韧的赞歌——浅析严歌苓的《小姨多鹤》中女性形象[J].合肥:安徽文学,2009(9):5.

(上接第97页)作用。王小盾教授就曾撰文《东干文学和越南古代文学的启示——关于新资料对文学研究的未来影响》,就这方面的问题做过一些有益的探讨。东干第二代诗人十四儿,在众多东干现实主义作家中显得异常特别。因为他的诗作试图表达一些现代性的主题,比如对生死的考虑、对时间的焦虑意识、对孤独的彻骨体验等。“当他企图用东干诗歌表达死亡、永恒、历史、孤独等主题的时候,作为创作基本条件的东干语文,便成了他的镣铐。他不得不对旧意象加工,通过意象联结、延长、散文化等方式来创造新意象。”^[9]王小盾做出这样的判断,基于对诗的某种特定认识:诗在本质上是一种非日常语言,诗要超越口语。他还对汉语书面诗与十四儿的诗歌作对比,认为十四儿为了不因同音字发生歧义,不得不将汉语的书面语改成拖沓的口语,从而牺牲了诗歌的紧凑。当然,在这种分析背后也透露出作者的评价标准:书面语较之口语要更为凝炼、进步,更接近诗的本味。这些意见中还有值得商榷之处,诗歌是否有诗味并不在于它用口语还是书面语,书面语也会因其长期的固定性而显现出表达能力退化的现象,反倒一些口语更为生动、更有表现力。

东干文通过书报、广播、文学作品等载体在东干已经广泛使用了70年,渐臻成熟,它有完善的正字法、标点法系统等,证明了用拼音文字书写汉语是完全可行的。东干拼音文字为保持东干的民族独立性、保存与发展东干的文化做出

了很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东干语是汉语方言的变形,所以它的拼音文字的经验对汉语拼音文字的建立有重大的参考价值”^[10]。

参考文献:

- [1]鲁迅.且介亭杂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2][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 [3]丁宏.东干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 [4]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5]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纪事[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
- [6]林涛.东干语论稿[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 [7][联邦德国]吕恒力.30年代苏联(东干)回族扫盲之成功经验——60年来用拼音文字书写汉语北方话的一个方言的卓越实践[J].语文建设,1990(2).
- [8]赵塔里木.中亚东干民歌的传承方式[J].音乐研究,2003(1).
- [9]王小盾.东干文学和越南古代文学的启示——关于新资料对文学研究的未来影响[J].文学遗产,2001(6).
- [10]杜松寿.拼音文字参考资料集刊:东干语拼音文字资料[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